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2-0180-05

# 试论“中国马克思学”的四维建构

## ——基于马克思内在语境和时代语境视角

邓学源 沈其新

**[摘要]** 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需要把握好四个维度。在逻辑前提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立足中国实际;在发展向度上,应基于历史深度和现实高度,充分借鉴国外马克思学的有益成果;在价值诉求上,“中国马克思学”应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在指导思想,必须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只有科学准确地把握这四个维度,“中国马克思学”才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学”;建构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要求在中国创建和发展马克思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曾枝盛教授认为,“重建马克思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王东教授则明确提出了“创造中国马克思学”的命题,并在学术专著《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主义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中对这一命题作了全面的探索。诚然,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已经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创建“中国马克思学”不仅是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破旧有余,立新不足”困境的必由之旅,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因此,对于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的呼声,我们应当予以积极的响应。本文认为,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必须具备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具体来说,就是要科学准确地把握好以下几个维度。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立足中国实际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始终成为时代精神精华的根本基础。邓小平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sup>[1]</sup>(第213页)这就告诉我们,开创“中国马克思学”,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就是要对马克思作出富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解读,即坚持实践的标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相结合。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实践发展的要求。首先,从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实践来看,西方马克思学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新见解,是我们以往研究中很少涉及或绝不会想到的。如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亨·德曼在《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是马克思成熟的顶点,而晚期马克思的著作则是“创作能力衰退和削弱的结果”,直接引发“两个马克思”的争论。德国学者费切尔也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真正要素,并进一步把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解释直接针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威胁,提出要“争取青年马克思作为一个同盟者,来反对这些形式的变本加厉的野蛮状态”<sup>[2]</sup>(第5页)。吕贝尔则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者,因为马克思“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灭亡的科学规律及其对人的行为影响的内在结果联系起来,为社会主义

乌托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sup>[3]</sup> (第26-27页)。吕贝尔甚至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提出不是马克思思维方式的产物,而是恩格斯的杜撰,“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可以称之为‘20世纪的神话’”。对于这些新思想、新见解,我们既不能盲目认同,也不能一概否定,要想对此进行透彻的批驳,就必须作出深入研究,积极开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家的交流对话。其次,苏联马克思学起起落落的曲折发展实践给了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苏联马克思学从开始形成时就存在着因历史条件而造成的重大理论缺陷,特别是1931年在梁赞诺夫被撤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职务后,苏联开始了日丹诺夫“一刀切”的马克思学范式,简单化、贫乏化、僵化、教条化是其主要历史局限。我们要吸取马克思学研究僵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的经验教训,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对待马克思学的创建和发展。最后,从国内的实践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领域一直没有实现对苏联模式教科书理论体系的根本性突破,旧未破,新难立。新的时代、新的国情、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解读模式,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创新。

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以学院化的学者为主体,标榜“价值中立”,运用文献学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解读马克思,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解读模式,这种模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但由于解读者文化背景、研究目的、使用方法等不尽相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文本解读的正确性。因此,西方马克思学常常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未能能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探究它的真伪。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首先不在于它纯粹的学术价值,而在于它把哲学的主题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因而,要充分体现“中国马克思学”的价值,只靠从文本中找出多少与时代切合或适用的引语,那是远远不够的。正如马克思指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sup>[4]</sup> (第541页)马克思文本是历史的、既成的,“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不能局限于马克思文本,而必须到实践中去科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从马克思文本解读中开掘出适合中国实际的思想资源,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的话语体系。

当代中国实际既是历史的,又是具体的。一般认为,当代中国的实际主要包含两重内容: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一方面,我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传统文化特有的多元兼容和综合创新的精神气质,深厚独特、源远流长的古典解释学,使得“中国马克思学”在解读马克思哲学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中国马克思学”应该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精粹,借以丰富“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突出“中国马克思学”的民族特色,赋予“中国马克思学”“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sup>[5]</sup> (第534页)。另一方面,要注意用“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来审视、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二是中国的具体现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对马克思文本进行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发是“中国马克思学”的重要任务,但“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最终还应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来。“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要运用解读马克思所获得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见解分析和反思中国的具体现实,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的问题,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立足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同时,当代中国的具体现实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这就要求“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还应把“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sup>[6]</sup> (第248页)。

## 二、基于历史深度和现实高度,充分借鉴国外马克思学的有益成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有在科学把握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与国外马克思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展开广泛的交流和对话,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一切有益成果,“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讲,20世纪20年代,梁赞诺夫在列宁的支持下率先提出了“马克思学”这一概念,意在强调从学术的角度对马克思及其著作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以构造一门严密的科学。30年代后,梁赞诺夫被撤职流放,苏联开始了日丹诺夫“一刀切”思想指导下的马克思学研究范式,从此“马克思学”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代名词。1959年,吕贝尔主持出版《马克思学研究》杂志,在借用梁赞诺夫的“马克思学”概念与“马克思学”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马克思学概念和研究方法。可见,马克思学并非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专利,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有历史依据和实践基础可寻的。同时,我国具有独特深厚的古典哲学智慧传统,古典解释学与文献学传统;中国文化具有多元兼容与综合创新的精神气质传统;再加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已有30个年头,因此,“中国研究马克思学的实践基础特别深厚,实践需要也特别强烈”<sup>[7]</sup> (第54页)。这些都是“中国马克思学”在文本解读及吸收国外马克思学有益成果方面的有利条件。其次,就现实的高度而言,世纪之交,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最大哲学家”,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的热潮,“‘马克思学’的事业已经逐渐变成全人类的事业”<sup>[8]</sup> (第111页)。如冷战后,“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辑委员会”联合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许多专家,共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进行整理、编辑和出版,各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大量发行。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伟大的实践

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引领伟大的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分析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不断推进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创新,并运用这些科学理论来指导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具有良性的学术积累,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不乏值得我们借鉴与吸收的地方。例如,一些西方马克思学者通过对黑格尔、亚当·斯密早期思想的解读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马克思与斯密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理解马克思开辟了新的路径。又如,苏联、东德丰富的马克思学研究成果是我们的一笔巨大财富,这些研究成果将为“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打下牢固的文献学基础,有利于我们避免做一些低水平的重复性工作,并为“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在研究方法上,国外马克思学研究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西方马克思学的特点是有‘思想’,而东方马克思学的特点是有‘材料’。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是马克思学研究的最高境界。”<sup>[9]</sup>(第 101 页)这种“境界”也是我们“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在研究进路上我们要强调西方马克思学与东方马克思学的有机结合,既要注重对义理的梳理,也要重视对文本的考据。在研究态度上,西方学者虽然提出“两个马克思”、“三个马克思”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但他们又首先对此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驳,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及严谨的学术态度的确值得我们学习。近年来,在马克思学研究方面,我们积极地进行了国际交流,已经有专家参与了 MEGA2 的编辑整理出版工作,国内一些科研机构、高校也已派出一些学者、专家去国外向马克思学专家学习。一批关于马克思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如曾枝盛的《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论》、鲁克俭的《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等,同时,国外一些著名的马克思学家也开始到我国讲学,如德国的伊林·费切尔就曾经几次应邀来华讲学。英国的马克思学专家戴维·麦克莱伦也多次来华讲学,其文章和著作也在我国翻译出版。这表明,“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已经开始迈出了由“本土视域”转向“世界视域”的积极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国外马克思学的对话过程中,有的中国学者缺少以自己的眼光去审视西方马克思学的自觉,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盲目追随西方时髦,刻意炒作一些学派、人物、概念,以西方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学术,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窒息了自身的创造活力。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依旧承袭过去意识形态化的立场和观点,继续批判西方马克思学。这些都是“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走出的误区。总之,“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只有以独立创新的理论勇气和自觉意识,既认真借鉴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研究的有益成果,又不拘泥于它们的理论框架和解读模式,这样,我们才能开创既富于时代精神,又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型马克思学,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

### 三、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

“中国马克思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和精神奠基,这就决定了“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应该而且必须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体系。

首先,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是随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诚如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sup>[10]</sup>(第 161 页)列宁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坚持“总的指导原理”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今天,我们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把对马克思生平、文本(献)、思想和实践进行的解读研究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其目的就是要深入挖掘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源头,在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中汲取源头活水,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使“马克思的理论”的应用“在中国又不同于俄国”,这本身就已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其次,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并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根本原因,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与时俱进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

“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仍然难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思想理论资源。因此,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直接面对马克思本人文本探求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直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本义,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奠定坚实的文献学基础,才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开掘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源头。

再次,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是“中国马克思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马克思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矛盾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密切联系、相互依存的。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然要求,只有通过对其文本、思想的考证,通过对马克思生平、思想和实践的科学掌握,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马克思学”涉及马克思文本、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涉及对国外马克思学的借鉴研究,如完全拘泥于卷帙浩繁的文本,就容易深陷其中而丧失理论原则和方向。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时刻谨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将能够有效地防止对“中国马克思学”的任意发挥,确保“中国马克思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从而有利于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引导人们用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牢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工程。本文认为,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有效实施的重要着力点。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研究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去,从而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进一步转化为系统的理论认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是“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共同任务。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又大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通过“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结合,把这些规律性认识系统化、理论化,又将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创“中国马克思学”新局面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明和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马克思学”是一门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文本,科学、完整地研究马克思思想基本观点,并结合新的实际,通过理论创新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科学,其根本任务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就决定了“中国马克思学”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才能更好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理论铺垫。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社会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人们从事的各种实践活动,占有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好,建立和改变经济政治制度也好,都不过是手段和中介,唯有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才是最根本的目的。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观点。这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中国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和群众史观。“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要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寻找现实的道路。只有从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利益出发,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发现和把握客观存在的问题,揭示问题的实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忘却人民群众这一价值维度,“中国马克思学”就失去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逻辑前提与实践基础。因此,我们要以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标准去判断和衡量“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理论的价值归根到底在于其满足和适应人民需要的程度,“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要让马克思学真正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国马克思学”不能仅仅用思辨的语言去构造抽象、神秘的哲学体系,也不能是学术交流中的自由清谈,它要求用人民群众懂得的语言把马克思文本的抽象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具体智慧,使马克思学成为人民群众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有效思想武器,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外部客观世界和自己主观世界的有效思想武器。在实践层面,“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密切关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以人为出发点,依托人的主体性,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把发展建立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和入耳入脑的传播效果,使之真正成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新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贯穿于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精髓。作为一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理论铺垫的科学,“中国马克思学”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只有把握了这一活的灵魂,“中国马克思学”才能抓住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正确的政治立场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服务。“中国马克思学”绝不能和西方马克思学一样标榜“价值中立”,超越意识形态界限,更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阵地向西方靠拢,宣扬非主流意识形态,任意发挥马克思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治命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只有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解答和谐社会构建及其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为着力点,不断从马克思文本解读中开掘出新的源头活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 [参 考 文 献]

- [ 1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 2 ] Fetscher, Iring. 1971. *Marx and Marxism*.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 [ 3 ] Rubel, Maximilien. 1981. *Rubel on Karl Marx: Five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4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 5 ]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 6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 7 ] 王 东:《为什么要创建“中国马克思学”》,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 年第 3 期。
- [ 8 ] 曾枝盛:《重建马克思学》,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 年第 1 期。
- [ 9 ] 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概况及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启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 年第 1 期。
- [ 10 ] 《列宁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责任编辑 涂文迁)